

此,我们对1958年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缺乏总体性认知。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人文知识的获取、分析、集成和展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已有海量的图书、报纸、期刊、照片、视频等人文资料被数字化。面对这种日益强化的数字化情景,我们可以由此展开对海外中国学完整图景的窥探。比如,利用CiteSpace软件,通过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追踪及分析,可以将海外中国学的总体性与趋势性“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与呈现。另外,借助数字人文带来的便利,引入概念史的方法,以海外中国学中的重要概念为关键词,探寻其历史演化,分析其后的历史语境与缘由,由此构建起对海外中国学具有贯通性的认知和理解。

其三,以学术对话强化自塑之中国知识的在场。在强调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今天,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应更为突出地强化自塑中国知识的论述。宋月红认为,“长期以来的‘海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以研究海外、国外关于中国的认知为主,虽然依托关于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特别是新中国史研究,但大多数不包含‘以我为主’的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内容,导致中国学研究‘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和传播内容的‘主题性’的薄弱或缺位,这样的中国学以‘他塑’为主,而缺乏‘自塑’及其比较和互鉴,不仅不完整、不具体,更不具有主体性的本源性和原创性。”^①中国学的日益“世界化”,自塑的中国论述当然不应缺席,而且理应成为主角。如其所说,这就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以更大力度呈现自我建构的中国知识,努力使之成为国际中国知识场域的“主角”。

与此同时,笔者以为还应在此基础上提升学术能力,强化学术对话。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等人之所以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力,除研究的精深外,即在于主动参与国际汉学学术论题,与之展开对话。纯粹单向度的自我论述,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失去文明互鉴之追求。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今天,要强化自我论述的在场,更有赖于深度学术对话中的考辨和批驳。基于此,从事中国本体研究的中国学人,应内在的将域外学人的论著纳入考察视野,以书评或将其作为论著讨论对象等方式对其展开评析;专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则应更为主动地回到本土学术立场,通过提升理解本土的知识能力和思想能力,对“他塑”之中国知识展开应有的批判与取鉴。

总而言之,无论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属性及其发展趋向,还是对已有海外中国学研究知识的挖掘利用,都要求我们保有“整体”思想。这种“整体”思想,不仅将深化海外中国学研究,为建立起具有贯通性的海外中国学认知创造可能性,亦可由此对已有知识与实践展开提炼总结,更好地刺激与推动我们自身学术文化的变革发展,服务于全球化表达的推进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三问*

唐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学术领域,也被称为国外中国

^① 宋月红:《论国史哲学与发展新时代中国学》,《河北学刊》2023年第3期。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重大培育项目“新时代海外‘中共观’研究”(项目编号:02011903823092)的阶段性成果。

学研究、国际中国学研究。^①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起点,四十多年来,经过本领域和多学科学者的持续耕耘,该领域建制化的研究队伍与研究机构等学科平台已初具规模,也有了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学勤、严绍璁、阎纯德、张西平等学者对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作过讨论,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模式、学科特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但是,从“学科性”(disciplinarity)理论来看,该领域的学科化过程仍需要对一些基础性问题作出澄清,包括“为什么”“做什么”“是什么”等。^②

一、为什么要对海外中国学进行再研究?

开展一门学问,除了人们探求知识与真理的冲动,总有时代背景、社会需要和文化氛围等因素影响着,并在从事者那里造成种种使命感。日本科学社会史家古川安曾描述日本学术的种种宗旨变化:“过去的数百年中,‘信仰的科学’、‘教养与人格塑造的科学’、‘为学术而存在的科学’、‘健全体制的科学’、‘为产业服务的科学’、‘为国家服务的科学’这种种不同的科学理念和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情境下轮番登场。”^③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学术界兴起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从学术情报工作起步的。早期的重要开拓者孙越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工作时,经手加工过的学术资料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情报学等十余个学科,海外中国学只是其中一种。孙越生曾自陈重视海外中国学情报资料工作的心曲:“在体会咬文嚼字乐趣的同时,也常感国家落后却经常以豪言壮语来浮夸的苦涩滋味。所以,在介绍学术文献资料时,我更多地倾向于介绍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以冀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④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孙越生痛感“现代海外中国学……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⑤可以说,这时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一种“补课”式的学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忻剑飞提出:“可以把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提到对外开放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由此,“中国研究外国,外国研究中国,中国再研究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变得十分自然而迫切,不可避免而需要自觉”。^⑥从“补课”到“交流”,意味着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国外(主要是西方)的中国知识有了更平和的心态。“揽镜自照”不必再负着“自惭形秽”的心态。正如张国刚所说的:“中国文明正是通过不断校正与‘西方’的距离,来反思认识自身的特点。通过认识他者来

① 本文采取广义的“中国学”概念,即将汉学和当代中国研究两个知识传统都纳入中国学范畴,如刘东所说的“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参见刘东:《狭义的汉学和广义的汉学》,《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行文中,有时细分出海外汉学(Sinology)和海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研究,对应着外国有关中国学术中的汉学和中国研究两类知识传统。由于汉语词汇组合的灵活性,“海外中国学研究”概念本身也因偏正结构的不稳定而出现歧义,既可以指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也可以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习惯上我们采取后一种理解。

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学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分类依据包括“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五方面”。

③ 古川安:《科学的社会史: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杨舰、梁波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④ 参见《孙越生自传》,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

⑤ 孙越生:《编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⑥ 忻剑飞:《重视国外“中国学”》,《读书》1985年第7期。

认识自己,这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常态。”^①

除了学术上的“知己知彼”“洋为中用”,^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还有一种功用性的思量,即作为了解对象国对华决策关键人群和关键思维的一种手段。正如刘东所说的那样:“先是美国为了了解中国,而培养了自己的中国通,后是中国为了了解别人对中国的了解,又开始培养通晓那些中国通的通才。”^③这种思量实际上将海外中国学研究带入国际关系领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借鉴和批判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加强和丰富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是开展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目的”。^④ 21世纪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宗旨与目的发生了两种较为明显的变化趋势。

一种变化趋势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功用性色彩不断加强。对各国中国形象、中国观的研究异军突起,成为研究热点。早先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忻剑飞、周宁等人,主要是哲学和文学背景,而近十余年传播学、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纷纷涉足其中。^⑤ 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加盟,改变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由人文学科学者主导的格局,也使本领域研究的实用性从更基础的情报功能向更深入和直接的决策参考发展,尤其是服务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国家战略。支撑此类学术的理念也不再是简单的“知己知彼”,而是要主动作为,将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运用于“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学家工作”等对外传播工作中。

另一种变化趋势是对中国研究的自主意识越来越浓。一是要求摆脱对海外中国学的盲目迷信,并且开展平等对话。张西平认为:“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走出了对海外汉学陌生的阶段,因而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了,平等地与汉学家对话、务实地与汉学家切磋学问的时代开始了。”^⑥将外国研究本国的知识引进本土,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可以说举世罕匹。经过数代人的耕耘,各国的中国研究成果被持续引进、介绍,不仅涉及美国、欧洲、法国、日本、俄罗斯等传统的中国研究大国和地区,近年来拉美、非洲、印度等新兴国家和区域的中国研究也得到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术界得以更加全面地感知中国知识生产的全球景观,从而为对话打下了平等的基础。

二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研究真正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之际,中国对自主的中国学知识体系的渴望在不断加强。在这种意念下,海外中国学研究不再是为了“揽镜自照”或“互相参看”,而是要融通中外并“以我为主”。在实践层面,本土化的中国学主要表现为面向国际学生的专门学位项目。从2009年起,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纷纷开设“中国学”专业项目,这类项目与文化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4年启动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宗旨相同,即帮助外国青年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

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也有类似的教学项目和研究计划。日韩两国通过明确标举跨文化交流

① 张国刚:《文明史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孙越生:《介绍两种关于外国研究中国的连续出版物》,《出版工作》1979年第12期。

③ 刘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④ 朱政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刍议》,朱政惠等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5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⑤ 参见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季乃礼:《国家形象理论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⑥ 张西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1978—2019)》,《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立场,来构建所谓“国际日本学”“全球韩国学”,借此提升该国文化软实力。^①俄罗斯则有莫斯科大学开设的“俄罗斯区域学”方向,该方向的学生不仅从事该国国情研究,还向外研究俄罗斯在整个当代文明世界中的位置,并以此塑造国家形象。^②

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国外研究、认知中国的知识成果,也涉及生产和传播这些成果的主体。

现代认知心理学区分了“冷认知”(cold cognition)和“暖认知”(hot cognition),以前者来指称那种主要基于逻辑思维、偏于理智的认知活动,而后者是受动机(意志)、情感影响较大的认知活动。^③“知华”要的是对华“冷认知”能够客观中立,“友华”要的是对华“暖认知”基于对华友好的立场或态度。我们说的海外中国学,大体属于“冷认知”范畴,因为学术活动正是以信息收集、逻辑思维、批判思维这类“冷认知”为基础。中国形象也是认知结果,但形象认识容易受主观情感的影响,更接近“暖认知”。^④

海外中国学研究首先是对作为“冷认知”的“学”的再研究。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从历史学角度较为清晰地规划了一个知识史向度的海外汉学研究应该做什么。具体而言,他提出“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涉及汉学的学术史(起源、发展、各方面成就及未来趋势)、知识社会史(汉学家及其著作受当时当地社会文化何种影响)和知识交流史(汉学对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影响)三类问题。^⑤

比较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严绍盪从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对中国学作出定义,他强调:“国际‘中国学’”不是我们“‘中国人’研究本国文化的自然延伸,它是一门世界各国研究者具有自我哲学本质的世界性学科”。^⑥与强调“科学无国界”的理性主义立场不同,将多元文化立场赋予学术智识成果,意味着重视不同文化传统对学术知识生产的影响,如同美国学者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中说的:“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赋予了这些因素不同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历史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科学传统,这些都根植于每个民族历史的特性。”^⑦

在严绍盪看来,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的“确定性的学术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研

① 例如,日本法政大学的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RCIJS)以“作为跨文化研究的日本研究”“日本文化的国际性”为导向开展研究(参见该中心官网介绍,<http://www.hosei.ac.jp/english/institute/japan/>);韩国西江大学开设的“全球韩国学”本科专业(设在通识学院),旨在培养具有国际交流能力、能向世界讲好“韩国故事”的人才。

② 陈佳和:《在莫斯科科学“区域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留基委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的回顾与反思》。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413740 [2023-10-12]

③ 参见齐瓦·孔达:《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周治金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章、第六章的相关论述。

④ 例如,“我们这里将要描述和论述的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其实就是日本人认识和看待中国的一种态度或者观念”,参见梁云祥:《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变迁》,《人民论坛》总第680期,2020年9月。又如,杨栋梁提出:“‘中国观’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场域”,参见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卷《总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⑤ 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刘国忠:《李学勤先生与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国际汉学》2019年2期。尽管李学勤是就国际汉学研究而言,但同样可以扩展到海外中国学研究。

⑥ 严绍盪:《我对“国际 Sinology”学术性质的再思考——关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的研讨》,《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

⑦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0页。

讨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二是“研讨中国文化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三是“探讨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四是“研讨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①

关于严氏所提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似应属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对象,但后者传统上更关注的中外文化的直接交流(包括器物、制度、知识、思想等),重视对交流过程的历史叙述。^②

严氏所说的第二个方面,“中国文化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并非关注重点。例如,近代以来,日本指称研究中国的学问就有“汉学、支那学、中国研究、中国学、东洋学”等至少五种日文名称,这些学问名称尽管大同小异,但“会在该领域的学者、专家间因着时代、观点或方法等方面,时而微妙、时而极其尖锐地反映出差异来”。^③对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显然超出一般意义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范畴。又如,当代美国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顽固而普遍的印象,残忍狡诈的“傅满洲”形象和善良聪明的“陈查理”形象既相互矛盾,又持续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④理解这类现象,既不是典型的历史学选题,也非单纯的历史学路径所能胜任,需要特别关注中国认知的成果形态和传播载体,并调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资源。

严氏所提的学术内容,尤其是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涉及海外中国学研究如何看待其对象问题,亦即作为对象的中国知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知识?20世纪物理学对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带来的知识危机以及知识社会学、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理性主义关于知识确定性的独断论。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就区分了所谓“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在《东方学》一书中,他十分郑重地声明:“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只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⑤选择这种后殖民理论立场,意味着将中国知识主要当作“政治知识”,^⑥在这种预设下,“中国知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社会知识和道德性知识,一种没有固定的外部现实可以依傍的知识”。^⑦

可以说,如何将域外对中国的认知对象化,不仅需要明确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也需要规定其研究路径和价值诉求。围绕中国形象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把西方的中国形象假设是“西方文化的表述,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那就自然要“去追索其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又如何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⑧但是,如果持经验立场,将其视为中国现实的反映(客观但可能存在误差),或者将它视为一种信息,那对其开展的研究就可以同外交决策这类理性过程联系起来。^⑨

① 严绍疆:《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

② 参见李光宗、王永平:《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齐鲁学刊》2016年第1期。

③ 赖振南:《日本汉学研究的历史背景概述》,(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1期。

④ Oliver Turner,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Identity, power, policy*, Routledge, 2014, p. 1.

⑤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9页。

⑥ 与“暖认知”不同,“政治知识”强调的并非主观意志、态度对认知的影响,而是权力结构对知识生产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

⑦ 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张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274页。

⑧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⑨ 参见张苾苾:《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严氏所提的第四个方面的内容,针对的是各学科内的中国知识。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否以及应该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学科化中国知识,是一个令人纠结不已的问题。我们不时看到由学科研究者在《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学科刊物上发表的对海外同行研究中国问题的综述文章,^①尽管这样的成果可以归入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但在学科学者看来,这是其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②有学者对此提供的愿景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学科群的建设,是学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③

更令人纠结的一个问题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生产的中国人,他们的独立成果或与外国学者的合作成果要不要以及如何纳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考察视野。事实上,在海外的中国学者,已成为改变全球中国知识生产格局的关键力量。美国历史学者林恩·T·怀特认为,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变化来自美国华裔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籍学者的大量加入。”^④从积极方面看,中国学者加入中国知识生产,有助于改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霸权。^⑤但消极的一面也不是没有。据日本学者毛里和子介绍:“近年来的中国研究有三分之二都是由中国的个人或集体参与,非中国人的中国研究在减少,这是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⑥如果说海外中国学的可贵,主要是由于文化异质性而带给本国人的“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毛里和子所说的现象有可能会把我们反观自照的参照系变得失缺多元性与异质性。^⑦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思想异质性”更强的那些成果作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而不再纠结于它们是否有中国学者的参与。

三、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作为一门学科么?

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就提出:“国际汉学的研究,或者说是汉学史,应当被作为一个学科来开拓。发展这个学科的时机,当前已经成熟了。”^⑧尽管相关呼声早已出现,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仍是横亘在该领域从业者那里的一道“骨刺”。这个问题其实要从应然与实然两种角度来思考,即它是否是一门学科和它应否成为一门学科。

究竟怎样才算一门学科(discipline),学术界有过非常广泛而细致的讨论。综合这些讨论的意见,构成学科的属性或要素被从三方面进行了总结,包括认识论的、社会性的,以及体制化和组织化的。这里的社会性是指学科不仅要有自身相对独立和稳定的认知特性,还意味着是一种独特的群体性实践活动,人群、行为、互动方式以及实践知识的教育传承都属于学科社会性属性的内容;而体制

① 例如:张春满、郭苏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脉络、议题、方法、前景》,《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刘鹏:《三十年来海外学者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国家性及其争论述评》,《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陈那波:《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曾提示当代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的了解应该视为“专业基础课”而非“专业课”。参见李佳钰:《“海外汉学”不只是一面镜子》,《新京报》2018年4月21日。

③ 朱政惠:《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④ 林恩·T·怀特:《中国政治研究:此领域的研究状况概述》(上),毕文胜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林恩·T·怀特:《中国政治研究:此领域的研究状况概述》(下),毕文胜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

⑤ 参见石之瑜:《世界知识的中国回应:认识、立场及其他——以政治学为例》,《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⑥ 毛里和子:《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⑦ 刘东:《跨文化阅读的汉学资源》,《东方早报》2014年3月2日。

⑧ 李学勤:《汉学漫话》,《东方》1995年第1期。

化和组织化主要是指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建制安排,包括院系、学位、课程体系设置乃至教师评聘与升迁的规则等。^① 关于一门学科在认识论方面应具有哪些资质,存在众多意见。其中,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影响尤大。在库恩那里,“范式”被视为区分学科群的核心概念,形成了范式的可以算作成熟的学科,否则还是处在前范式发展阶段的研究领域。^②

限于本文篇幅,笔者不拟细致展开学科化理论的相关讨论,并且将上面提到的社会性与建制化归并为学科的社会性。从这方面看,海外中国学研究初步具备了学科化的条件。据2021年底的一次摸底调查,目前国内从事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机构有三十家左右,高校中以海外中国学或相近名目招生的博硕士学位或专业方向也有近十家。^③ 一个新动向是,“中国学”正取代“海外中国学”成为国家认可的学科名目。根据教育部2022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自设了交叉学科门下的“中国学”一级学科,所涉一级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等。^④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轮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中,29个重点学科受到资助,其中也包括“中国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科化的“应然”问题。如果我们将国内的学科设置视为政府配置学术资源的一个基本参考系,那么海外中国学研究或者更广义的“中国学”开始在这个体系中占据独立的位置,多少改变了长期以来依附发展的窘境。^⑤

不过,在认知层面,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否是一门学科还面临较大挑战。研究学科文化的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 Trowler)指出:“一门学科是否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即学术可靠性、知识的主旨和内容的恰当性等一套概念,尽管对它们没有严格的界定,但却是约定俗成的……对于那些沉溺于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在理解何谓学科时似乎毫无困难,而且能够自信地参与讨论学科界线及一些尚无定论的个案。”^⑥ 现实情况的确如此,在争取学术资源时,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遗余力地为学科合法性正名,但在识别它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时,常常会出现犹豫,更多还是将它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看待。

① 英国学者安吉莉可·切提帕拉姆(Angelique Chettiparamb)曾在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长篇文章综述中汇总了相关讨论,参见 Angelique Chettiparamb, “Interdisciplinarit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2007. https://oakland.edu/Assets/upload/docs/AIS/interdisciplinarity_literature_review.pdf [2023-10-12]

② 参见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③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褚艳红2021年的调研,目前国内从事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机构约有三十家。实体建制的机构数量较少,主要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以及2023年6月成立的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招收海外中国学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的高校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主要依托的是文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

④ 参见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neirong/fenlei/sxml_gdjy/gdjy_xwgl/xwgl_glb/202209/t20220908_659458.html [2023-10-12]。与“中国学”相关的,四川大学自设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另外,三个“中国学”学科都涉及的一级学科是政治学和应用经济学,其次才是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类学科项目对应用性的强调。

⑤ 根据各家对“中国学”的理解,笔者提出一个简单的综合解释:“中国学”的学科内涵,简言之,就是通过对“国外(或海外)中国学”的分析、比较,促进平等交流、充分对话的“国际中国学”,从而形成整合多元又包容异质的“世界中国学”(即沟口雄三所说的“各种特殊性之间的普遍性”),当中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的建构作用时,可以简称为“中国学”。参见石之瑜:《把海外中国学放进关系脉络》,《文汇报》2019年11月1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对“中国学”的简介,参见刘伟:《我们为何要打造“中国学”学科》,《光明日报》2014年6月17日。

⑥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第43页。

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看上去像是一种“知识的次生过程”。^①这一“次生过程”很大程度影响着该领域研究的方法。早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以翻译、介绍、述评为主;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有所变化,研究型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评述类文章仍占较大比例。^②如果说40年前孙越生等人筚路蓝缕的资料性工作构成当年哲学社会科学“补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信息不畅、外语人才不足的年代有其独特时代价值,那么步入信息时代后,学术资源获取和中外文转译的成本迅速下降,原来的门槛已不算障碍,以译介为形式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价值也随之大幅下滑,即使综述、述评形式的研究,也可能被讥为“拾人牙慧”之学。根据美国学者哈里斯·库珀(Harris M. Cooper)对文献综述法的分析,学术综述可分为研究汇综(research syntheses)与理论评议(theoretical review)。^③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中,前者仍是绝对多数。

客观而言,目前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其他学科方法与理论的“消费者”,特别是对历史学、比较文学(文化)的消费。^④这种困境甚至也存在于作为对象本身的“海外中国学”那里。美国中国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就说过:“中国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理论进口阶段’,还没进入‘理论出口阶段’。”^⑤如此一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大概率应属于库恩所说的学科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在库恩看来,这个阶段“人们主要是收集事实,这种收集几乎是任意地,不参照任何已接受的规划或理论结构”;只有当学科拥有了“范式”(某种理论与方法的混合物),就有了“一种用某个特殊的科学分支所提供的透镜观看世界的方式”,^⑥类似于学科的世界观。尽管沟口雄三等人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理念,^⑦但总体而言,他无非从东方的视角,回应了一个国际学术多元主义的潮流,即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并相信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带入学科,有助于改变欧美经验占据范式地位的状况。^⑧

在笔者看来,本领域研究遭遇的认识论挑战还在于黄宗智曾指出的问题:即中国研究领域被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所主宰,在他看来,这种知识立场的碰撞如今已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⑨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在中外学术交流场域中浮现、生成的知识领域,如何通过这门学术推动和深化文明间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是本领域学者应该始终关怀的初心。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刘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② 参见唐磊:《从文献计量视角考察“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的自我建构》,《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

③ Harris M. Cooper, “Organizing knowledge syntheses: A taxonomy of literature reviews”, *Knowledge in Society*, Vol. 1, No. 1, 1988, p. 109.

④ 例如,张西平提出:“从研究的方法而论,所有研究海外汉学的学者都必须遵守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外语能力只是迈进海外汉学研究的入场券,历史学方法才是登上这个研究舞台的捷径”,参见张西平:《作为专门史的海外汉学》,《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

⑤ Elizabeth 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9, 1994. pp. 704 - 713.

⑥ 戴维·罗杰·奥尔德罗伊德:《知识的拱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历史导论》,顾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1—532页。

⑦ 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甦平、龚颖、徐滔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6页。

⑧ Kevin J. O'Brien, “Speaking to Theory and Speaking to the China Field”, *Issues & Studies*, Vol. 54, No. 4, 2018.

⑨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